

乡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 Z 村的考察

陈立豪, 陈 波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场景是解读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切入点。乡村文化场景系统构成要素可分为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多元主体环境和治理系统,其时空演化具有非线性、自组织与他组织、内外部动力共同驱动等重要特征。结合对湖南省岳阳市 Z 村发展实际的考察,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机制可以分为生活性进程、生产性进程与生态性进程。优化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秩序,可尝试从空间赋能着手,焕发乡村文化场景;重塑秩序,培育多元主体,激活乡村文化场景生活面向与生态面向。对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的理论分析,丰富和深化了文化场景理论与乡村演化研究,为乡村转型发展与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11-0074-12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 village

CHEN Lihao, CHEN Bo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ural cultural scenes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interpreting the inherent logic of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rural cultural scenes system includ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diverse subject environment, and governance system.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ha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nonlinearity, self-organization and hetero-organization, and joint driving forces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dynamic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Z village in Yueyang City, Hunan Provinc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rocesses: life-oriented, production-oriented, and ecology-oriented. To optimize the evolution order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it is possible to start with spatial empowerment, revitalizing the rural cultural scenes. At the same time, by reshaping the order, cultivating diverse subjects, and activating the life and ecological aspects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aims to enrich and deepe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cenes and rural evolution research,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cultural scene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mechanisms

收稿日期:2023-08-12 修回日期:2023-1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政策创新研究”(20ZD01)。

作者简介:陈立豪(1997—),男,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通信作者:陈波。

1978至2021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至9.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升至64.72%^[1]。大规模城镇化进程驱动城乡间和地域间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2],加速了乡村现代化进程。然而,广大乡村地域正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主体的空心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日益弱化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价值认同危机等问题日益凸显^[3-6]。

乡村演化经历了生产驱动、消费驱动、多功能和全球化等阶段^[7-9],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变作为乡村演化的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这种研究与乡村聚落土地资源利用、人居环境变化和城乡及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等领域的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从地域维度看,对于任何一个乡村聚落,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同地区的乡村,内部的组成要素、结构与布局均有明显差异,因此表征的场景类型也不相同,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等维度。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要清晰地了解乡村文化场景特征和演化过程,以认识乡村社会的本质和变动趋势,理解广大农民在转型社会中的现实处境,掌握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可行路径和目标方向。因此,深入理解乡村文化场景及其时空演化过程是实现乡村建设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前提,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

一、相关研究梳理

作为中华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乡村文化场景是乡村居民参与生产、生活和消费的结果表征,并伴随着长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互动被不断地更新与重构。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化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各种农村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10]。

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日益复杂的人地关系,乡村文化场景演化成为管理学、社会学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乡村文化场景作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是村落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

是中华乡土文明的活态表现。场景理论强调文化是推动地区发展的动力,而文化的魅力蕴藏在文化场景之中,这集中体现了文化要素在乡村空间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研究脉络梳理可以发现,早期的研究者将社会变迁发展归因为生产力的进步与劳动分工的完善。伴随着近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统一地理区位的亲情共同体被打破分离成为统一地理区位下非亲情关系的共同体,反映出文化生活更替和文化价值内涵发展。文化场景理论的文化动力观念为发掘乡村发展模式与生成动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学界从结构与功能的视角对乡村发展与场景演化展开探讨。结构主义强调任何地理现象的讨论都需要在整体背景下进行。乡村文化场景演化是一种整体性变迁,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11]。从乡村地域功能角度看^[12],乡村文化场景本质是乡村主体活动与异质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映射,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的影响下不断丰富与演化^[13]。城市资本、人口和产业等要素的进入,使得乡村空间发生转型重构。此外,以消费本身和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从城市蔓延至乡村,使得乡村居民消费理念、方式、行为等发生重构,除传统的农业生产、文化传承等功能外,休闲观光、度假体验等新型功能应运而生。

乡村文化场景在转型与演化过程中呈现多种形态,学界研究者对其转型走向的判断不一,形成了丰富的论述。乡村文化通过内在结构的不断生成逐渐形成特定形态。当乡村文化场景融合不同类型的舒适物,其实用功能和文化内涵会更为丰富^[1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聚落特征不断转化。乡村经济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农民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分化。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也在发生转型。这些变化驱动了乡村文化场景的整体演化^[15]。

学界对于乡村转型与场景演化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成果与研究脉络。但是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对乡村文化场景的自生成逻辑有所忽视。乡村文化场景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需关注其不断生成的过程。第二,西方外来视角预设性。现有研究基本采用西方分析框架和核心理论,“来自遥远西方的他者”^[16]成为乡村研究的重要主体,乡村被看成有问题的,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虽然有研究关注到乡村内部文化传统与本土性,但未从本土传统出发开展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结构功能视角,进一步阐释了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分析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的过程和规律,可研究其自然生态系统、社会文化系统、治理系统与主体间的演变与发展,并揭示这些变迁背后的社会逻辑,为乡村转型发展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二、乡村文化场景的内涵与表达

乡村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17]。场景是地缘关系下人和人群在文化设施中所发生的活动所共同构建的社会活动空间,场景蕴藏着地方文化价值观和人群选择取向。乡村文化场景下的各子系统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等诸多要素流相互作用,使各子系统形成一个结构整体,进而推动整个系统发生变化,共同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与价值生成。

(一) 乡村文化场景内涵阐释

传统村落从古演化至今,其社会适应能力与变迁动力主要来自传承至今的文化价值,表现在通过地方性场景、传统文化和主体的能动性实现乡村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和治理^[18]。具体来说,乡村文化场景是产生于当地人对村落环境的适应、改造,并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互动和日常生活实践等方式进行传承,包括经验性知识^[19]、价值观念和宗族制度等,乡村文化场景的传承过程中往往会渗透到地方传统文化之中,比如建筑风格、民俗活动、传统风俗等,通过物理空间的塑造和精神文化的熏陶将乡村文化场景渗透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与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并建立起独特的、能够引领人们适应于当地环境的价值观念。乡村文化场景及其孕育的舒适物系统能够有效维持乡村生态社会系统保持稳定。

乡村文化场景是宏观的意象与微观的文化价值观的结合^[20],具有鲜明的可识别性。人们从整体视角考察传统乡村意象特征来区分具有相似文化特质的村落,同时从不同细节特征或层次上表征出其文化差异。当文化价值观获得了客观的分享性和合法性,更多的人尝试对其作出共识性的解释,逐步从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上升到宏观层面的意象。为了梳理其中的界限、维护、传承与演变,我们可以从横向(共时性)和纵向(历时性)两个角度考察。横向上,乡村文化场景体现出多重结构形式;纵向上,乡村文化场景不仅在个人或互动中流变或消失,同时存在代际传递等特征。乡村文化场景也是外在的物质表现特征与内在的精神文化符号的结合,物质空间场所必须承载乡村主体赋予的传统意义或现代意义上的特定功能,反映一定的社会制度、伦理、功能或者文化意义,才能真正成为具备可识别特征的乡村文化舒适物,进而构成乡村文化场景系统。

(二) 乡村文化场景机制系统分析

乡村文化场景演化发展可看作是一个不断运行的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和外部能量的转换来实现转型升级和质的飞跃^[21]。同时,乡村文化场景演化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时空过程和生态复合过程,需要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多元主体环境和治理系统4个维度构建系统结构。

自然生态环境维度主要是度量乡村生态环境容量变化程度。自然生态环境为乡村文化场景生成与演化构建了一个可生存的、可持续的物质基础平台,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户人居行为变化,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该维度旨在度量这种变化的强度和趋势。

社会文化环境维度主要是度量乡村社会文化变化程度。对于乡村而言,地方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当地居民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管理自然资源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乡村是一个具

有地域性、共识性的文化传统区,但随着城乡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的强势入侵使得乡村社会文化日渐衰微。该维度不仅可以揭示这种变化的速率,还可以明确地指出变化的方向。

治理系统是指在当地主体开发、利用和分配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时所实施的一套制度规则。它由政府、非政府自组织、行为规则、集体选择规则等组成部分构成,以制度和规则约束主体的行为。在传统村落中,治理系统以自治的方式体现为宗族组织管理的族规族约、乡村自治的村民公约等。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乡村人民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使得传统村落治理系统逐渐从自治向德治和法治转变。在旅游业的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的治理体系还面临着来自外部旅游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新挑战和机遇。

主体维度体现在具有能动性的个人或集体,如当地政府、村民、开发企业、外来游客等。以人为核心的行为主体是村落发展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也是系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同时多元系统中的行为主体贯穿系统发展的始终,其通过对外界扰动的适应与利用,在系统演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四大系统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不断推进乡村文化场景演化(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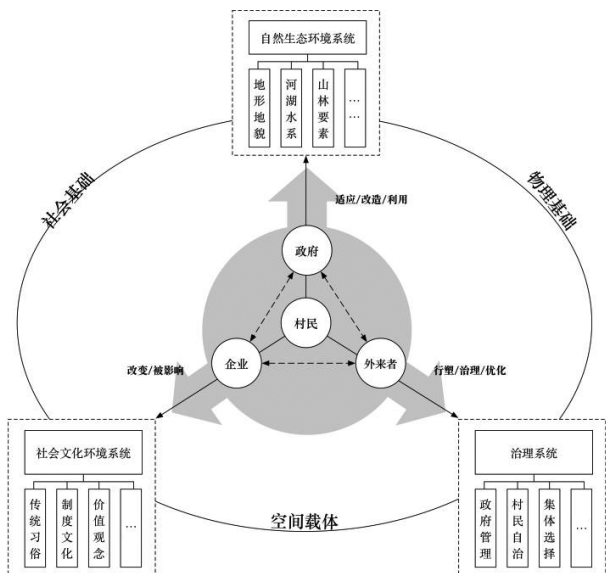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文化场景系统构成

三、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机理分析

乡村文化场景源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物质交换,这种交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人们需要进行社会互动,从而产生特定的生产关系^[22]。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乡村文化场景视作一个反映“人地关系”的整体系统,一个由一系列要素以特定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综合体,其中每一要素都有与系统目标相关的固定位置和功能,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在诸多时间节点上持续发生,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化则表现为诸多时间节点发生结果的累积^[23]。

(一)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内在逻辑

乡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场景系统内部以及与外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揭示了分析对象的多元性和复合性,也有助于打破线性叙事的局限。在这个互动场域中,各个分析单位的边界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换言之,每一个分析单位内部的运动都会受到其他分析单位的影响,并依赖于其他分析单位的运动。

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化折射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演化、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的变迁。乡村文化场景系统中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与治理系统等子系统构成了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客体系统,各子系统及乡村发展要素的交互作用塑造了乡村文化场景形态和结构体系,并对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推进速度、空间模式和运作方式施加重要影响。

第一,资本运作影响乡村文化场景社会结构。外部资本对乡村文化场景社会结构的影响日益显著。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快速推进,让乡村成为资本积累和文化消费的重要对象。在外部资本的作用下,乡村文化场景的运作和发展规律与城市文化场景类似,各类生产要素从城市向乡村蔓延并流动,导致乡村文化景观、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构。资本为了实现资产保值和获取更高的剩余价值,往往需要寻求更为合适的区域进行增值性转移^[24]。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制度的市场

化改革为“资本下乡”提供了制度渠道,开辟了资本增值的新空间^[25]。在外部资本运作下,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和网络关联发生了重组,社会分层得到了优化,乡村社会活力也得到了增强。同时,外部资本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资源连接,让乡村各主体的社会地位和话语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和资本化^[26]。

第二,政府权力介入重塑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中国乡村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复杂性赋予其独特的文化特征。面对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失衡、公共文化生活活力衰退以及农村人口的流动和留守等问题,原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员力、约束力和前瞻性的规划,这都需要国家政策治理来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子系统,承担着新的政治期望和社会需求。国家文化治理的介入可通过文化场景这个“介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通过“柔性治理”,实现社会控制向社会整合的转变。构建强有力的文化规范,可以实现现代化治理制度在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公共氛围、精神气质与社会心态,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并推动乡村精英的回归和地方组织的再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

第三,组织转变重构乡村文化场景治理结构。在外部群体介入和资本运作的综合作用下,乡村文化场景的组织模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等发生转变,从原本松散式、独立式的社会经济个体转向具有经济、社会联系的层级网络。总体来看,乡村文化场景治理网络更开放、更复杂,市场主体、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出现于乡村空间,产生了诸如空间冲突、权益博弈、权利分配等治理问题^[27]。治理方式由情感交流为主转向市场交易为主,治理结构从血缘、姻缘和地缘等关系转向契约、合同和雇佣关系^[28]。原有的村集体自治模式逐渐演变成企业、外部群体、村集体和村民等多方协商模式^[29]。为了实现空间利用最大化和各群体权益的兼顾,利益共同体逐渐形成。这种变化体现在治理主体的联合协商、治理对象的综合化和复杂化,以及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和数字化等方面(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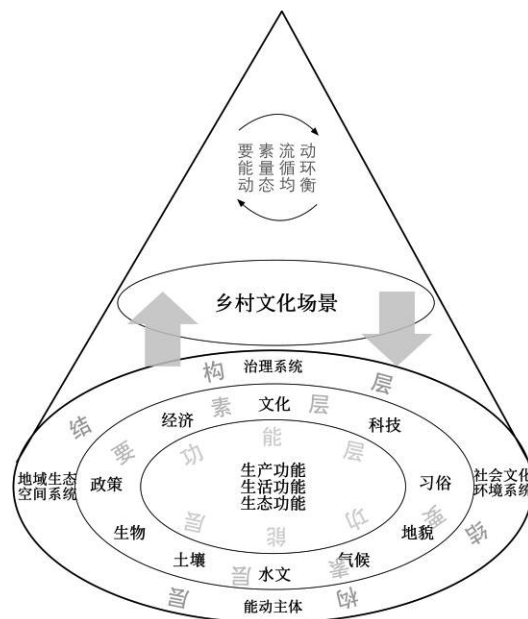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文化场景演化内在逻辑

（二）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动力机制

乡村文化场景兼具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包含着自然、人文等系统内部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外在环境之间较长时期的复杂作用。其背后动力机制表征为,外部权力与资本力量介入下,村落内部主体的能动性得以激发,最终形成内外合力推动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结果或者状态可通过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乡村文化场景特征及其演化予以表征或者解释^[30]。

第一,内生动力,即乡村文化场景的自组织演化。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是核心内生动力。发展初期,村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收入低且来源单一。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主体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明显。为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文化场景不断完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和创新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旨在助力新时代城乡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发展。第二,外生动力,即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他组织介入。他组织介入是外界力量驱动的组织过程,不是人居环境系统自身产生的过程。乡村文化场景演化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能够将文化、人口、经济、社会行为、科技进步与创新、制度体系等诸多因素融为一体,形成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

从内在运行机理角度看,外部力量的介入为乡

村文化场景系统带来挑战,生发系统内生动力,刺激村落主体做出行动以解决外部挑战带来的问题。具体可以分为冲击(shock)和压力(pressure)两种类型^[31]。冲击的出现会使得乡村文化场景子系统发生急速的响应并产生结构性的转型^[32],这可能包括人口流动、物理景观变化以及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当发生冲击时,系统必须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环境,这可能涉及人们生活、工作和相互交往方式的重大变化。相比之下,压力则是一种缓慢的变量,这可能包括土地利用变化、环境恶化和经济压力。与冲击不同,压力通常更难以识别和应对,因为它们的影响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会持续存在并且具有累积效应。地方主体往往会采取学习的方式,并通过地方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调整提升适应能力^[33]。

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化是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相互作用、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村民自治组织发展壮大是乡村文化场景演化发展的关键,但也存在关注个体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内部缺乏足够的再生产资本等问题。因此,政府政策规范、资本与现代化管理模式流入等他组织力量的介入也是系统有序演化的重要力量,能够弥补自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效率过低、资本不足和视野狭窄等问题,促进乡村文化场景的有序更新。

四、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机制分析

乡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部动力的共同作用。当新要素超过质变的临界点侵入乡村文化场景系统时,它会打破原有系统的边界,从而实现系统的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意味着乡村文化场景的转型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表现为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多元需求主体和治理系统的时空演变,表征为文化舒适物布局、功能及其特征的变化。本文结合对湖南省岳阳市Z村的考察,总结描绘出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的三大机制。

(一)Z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Z村凭借特色古民居与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文旅产业,文旅收入成为地方生产总值的主要来源。本文选取Z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主要基于以下3点理由:①Z村舒适

物价值的典型性。Z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县,位于渭洞笔架山下,村落内有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时期江南民居古建筑群。Z村古建筑群主体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93—1600),明清时期古民居保存较为完整,以当大门、王家墩、上新屋三大主要群体组成的古建筑群总面积达51000平方米,其中房屋1732间,天井206个,巷道62条,2001年Z村古建筑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②现代语境中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的聚焦。Z村作为中部地区传统村落,不同于中国东部沿海村落依托市场实现转型,凭借地方政府引导与居民自发组织,辅之以资本与智力支持从而实现文化场景演化。③伴随国家话语的渗透和消费的大众化,旅游经济逐渐下沉至Z村,Z村文化场景的演化是一部人类社会围绕地方空间的互动、博弈、调适的历史,每一时期都体现了场景系统要素的互动。Z村文化场景的线索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舒适物功能的转变,从曾经一元的农耕经济走向当今多元业态经济,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路径,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采用探索式研究方法。在探索式研究常用的分析方法中,单案例的嵌入性分析既可以保证案例挖掘的深入性和案例细节的完整性,又能发挥案例研究中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作用,增强案例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对Z村进行嵌入性分析,嵌入性分析的单位是Z村村委会、Z村景区管理处、本地村民、外来游客等利益相关要素。

本文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和二手资料收集的方法对Z村文化场景变迁进行全面调查。笔者在2023年7—8月进行了集中调查,后于2023年9月回访。访谈对象包括Z村村民、游客、政府工作人员、景区管理人员等,其中包括5家民宿,大多在Z村的经营时间超过10年,且基本为本地村民。调研期间住在村民经营的民宿中,能够近距离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为本文写作期间随时需要补充数据与当地保持及时沟通提供了可能。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旅游开发的持续进行,Z村文化场景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适应主体集体涌现,利益关联相互交错,使得文化场景系统演变趋向复杂化。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村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土地使用权、消费自主权和就业选择权,这些非线性要素的聚集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积累了能量,拉开了 Z 村文化场景系统演变的序幕。1991 年,Z 村专题片《岳阳楼外楼,洞庭天外天》发布,Z 村一举成名。为提升展示效果,获取更多经济收益,提升村落整体环境,1998 年 Z 村在村集体组织下进行了第一次的村落改造。随着物质、信息要素流动的加快,Z 村原有文化场景发生转型,同时在旅游产业的刺激下,新增了大量满足公众现代生活需求的舒适物。2001 年岳阳县成立 Z 村民俗文化指挥部,确定了

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建设策略,2002 年 Z 村成功评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而后,县政府多次招商引资旅游公司,让旅游公司主导 Z 村旅游开发的工作,拆迁了影响传统风貌的大量民居,规划了观赏路线,村内由此建设了一批文化娱乐功能舒适物。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Z 村村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逐渐改变了村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方式,越来越多的村民回到家乡,转而加入民宿、餐饮、土特产等个体经营队伍中。村内功利性、公共服务性、娱乐性等舒适物规模大幅增加,乡村文化场景开放性随之提升。Z 村在面向现代生活转型中平衡着保护与发展,避免沦为“文化孤岛”与空心化村落,其实践路径可作为乡村文化场景转型与乡村振兴的理性参考(见表 1)。

表 1 Z 村舒适物及其功能属性演化

时间			1990 年前								1990—2002 年								2002 年至今										
			宗法祭祀	传统节日	行政管理	自我管理	居住生活	日常生产	文化休闲	公共服务	旅游开发	宗法祭祀	传统节日	行政管理	自我管理	居住生活	日常生产	文化休闲	公共服务	旅游开发	宗法祭祀	传统节日	行政管理	自我管理	居住生活	日常生产	文化休闲	公共服务	旅游开发
功能属性																													
Z 村舒适物	社会文化	谷英公墓	●							●										●								◎	
		议事厅				●			●	●				○				●	○							●		◎	
		祖先堂	●				●		●	●	○				●		●	○						○		○		◎	
		纺绩堂					●								○													◎	
		接官厅				●				●				○	◎				○						○			◎	
		八骏堂	●				●				○				●										○			◎	
		青云楼								●									○									◎	
		西头岸					●									○												◎	
		碾米坊/油坊						●									○											◎	
		百步三桥(石桥)								●									●								●	◎	
		龙涎井/长寿井(古井)						●		●							●		●						●		●	◎	
		畔溪长廊(古驿道)							●	●								●	●							●	●	◎	
		当大门/旗杆石	●	●		●			●	●	○	●		○				●	○			●				●		◎	
		文塔				●									○													◎	
		孝友文化广场																◎	◎							●	●	◎	
		孝廉家风传承馆																								◎	◎	◎	
		民俗馆(文化礼堂)							●	●								○	○									◎	
		仿古民宿					●									●									●				◎
		土特产店铺																											◎
		商店/小卖部						●									●									●			◎
	本地饭店																											◎	
	研学/写生合作点																											◎	
	自然生态	龙形山/龙珠石	●					●			○						●									●		◎	
		后畲水库					●		●						●		●								●		●		
	治理系统	Z 村村民委员会			●								●							◎			●					●	
		Z 村管理处			●								●							◎			●					●	
游客服务中心																										◎			
停车场/厕所																										◎			
Z 村小学								●									●								●				
村医疗站								●									●								●				

注:●表示延续,○表示弱化,◎表示演化产生。

(二) 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进程分析

乡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等社会范畴的线性转换,而是多种价值表征在特定空间情境内相互交融、共存、竞争和冲突的辩证过程的体现^[34]。这些过程的展开使得乡村文化场景具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内涵,赋予其更为复杂的特征。

1. 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生活性进程:初始状态的积累

生活性进程是一种乡村文化场景生活空间不断营造的过程,解决的是在哪里建立居住点和养活多少人的问题。在宗族势力自下而上的营建过程中,乡村文化场景系统从混沌无序向低级有序过渡、从非组织状态向有组织状态递变。乡村文化场景的生活性进程核心议题在于孤立的、相对封闭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走向符号化、制度化与合法化,这些价值和意义如何在多主体之间得以实现共享,成为支撑人们生产生活的文化基础。

社会经济的生产、主体的空间实践以及文化的传承在社会变革中作为变量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迁,而自然地理大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常量具有“停滞”性质,这种性质从村域尺度赋予了诸多乡村稳定性^[35]。第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乡村文化场景系统发展创造了有益条件。如Z村群山环绕的地形,使得乡村与外界呈现出相对隔离的状态,从而可以成为战乱时期的避风港,并且在近代以来较少受到外部文化的冲击,这对乡村的发展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36]。第二,乡村文化场景的生活性进程充分挖掘地域特征并充分加以运用,见证了人与自然山水共生的人文智慧。Z村选址建村受传统家族意识等集体意识影响,村落呈“龙形”,当大门是第一代建筑,位于龙口处,与龙相伴,寓意保佑村民平安、吉祥、富裕且绵延不绝。乡村文化场景与物质空间紧密联系,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乡村文化场景的整体布局和物质空间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和秩序。

随着村民对乡村文化场景生活功能需求增加,如果生存资源已经分配殆尽,在单位面积的产

出不能增加的条件下,新增加的人口只能外出。因此,不少村民选择另觅宅基地新建住房,对乡村文化场景的空间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村民实现了非农就业。村民非农就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张,为外来要素的侵入提供了空间,也意味着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由生活性进程向生产性进程转变。

2. 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生产性进程:认同与分化

生活性进程中主要的任务是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在生产性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渐被凸显出来,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身体在场的日常互动秩序^[37]。在这个过程中,自我认同和自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自发的地域性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土地祭祀、宗教信仰、宗族组织、公共物品供应以及经济性的组织等^[38]。Z村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意识是村落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此影响,Z村形成了独特的“龙形聚落”以及砖瓦相连的民居建筑等生计文化层面的特征;在制度文化层面则生成了张氏16条家训以及5条族戒;精神文化层面造就了“孝友”的家风以及“尊师重教”的学风。即便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村民仍坚守着大屋建筑形式上的“合而不分”,并谨遵家训族戒,形成了积极的地方认同。

如果在演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自组织关系或者自我认同,也缺少外力强制整合的话,乡村文化场景演变的自然趋势就是趋于分散。随着信息流动加速和交通技术变革,人们的交流和社会生活超越了传统空间的边界,在地居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以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自组织暂时受到削弱。在生产过程中,外部引入的人际关系对开发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化的发展强调了从传统和社群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转变。

随着乡村文旅的快速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开展,传统村落不断受到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乡村文化场

景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人口流动等。乡村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乡村不再仅是粮食生产的场域,它们在消费领域的角色日益显著,与旅游、休闲以及生活方式等乡村消费活动紧密关联。在这一背景下,Z 村的相对价值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乡村土地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价值占据优势,而如今,其在旅游及其他审美文化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却日益显著。乡村本身作为一种“商品”,通过各种交易和购买途径实现价值再生产。如乡村的文旅消费行为、农村产权投资、乡村手工艺品的营销策略,以及通过推销乡村形象来推动其他产品的销售等^[39]。

同时,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政府主导与市场运营双轨并行,村民主体意识增强,多元主体进一步适应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村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得更加个体化,他们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礼”而行事,传统权威来源的影响也在逐渐消退,表现出对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对乡村文化场景的结构和价值表征产生了重大影响。

3. 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生态性进程:调和与共治

生态性进程是外来要素与乡村多元主体、乡村空间环境相互适应、相互耦合的阶段,是形成乡村文化新特征的关键阶段。在能量、信息和资本等各种流的相互作用下,乡村文化场景系统会做出相应的适应与调整,这也是复合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的一种适应过程。内生和外生动力的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主要力量,经历了政府管理和村民自治两个阶段。政府的强力介入可以促进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治理环境和推动传统文化更新等,是乡村文化场景演变的关键力量。系统的内部力量主要来自自下而上的村民自组织力。集体记忆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农村的经济改革削弱了“集体”的意识形态,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集体”仍是重要存在。乡村作为一种“集体”话语、记忆和体验形式,是重要的生产生活依托和价值归属,这将产生强大的历史和传统惯性^[40]。Z 村同宗同族的血缘情感联系构成了一种内化的社会网络,为村民们提

供了无形的社会纽带,增强了村民对 Z 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尽管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与游客、开发商之间的冲突,但这种价值观念仍然保持着稳定性。如旅游业的发展为 Z 村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吸引了部分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发展。这一阶段,平等主义、功利主义、企业性和族群性等维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伴随着城市资本的下沉,乡村在主动契合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的过程中突破着空间界线,并与外界建立广泛的交互,乡村文化场景也由单一、平面化空间逐渐转向多主体、多尺度和网络化^[41]。在乡土时代,中国的乡村是农耕经济与儒家文化广泛融合的村庄社区。这种结合促使乡土社会形成,其中人与土地密切共生,家园价值观和和谐的居民关系成为主导^[42]。这种乡村文化场景和基层治理模式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进入城乡融合时代,乡村治理已经脱离了传统乡土社会内生秩序,主要通过国家权力、产业形态和乡村共同体意愿等力量共同塑造了乡村文化场景的逻辑(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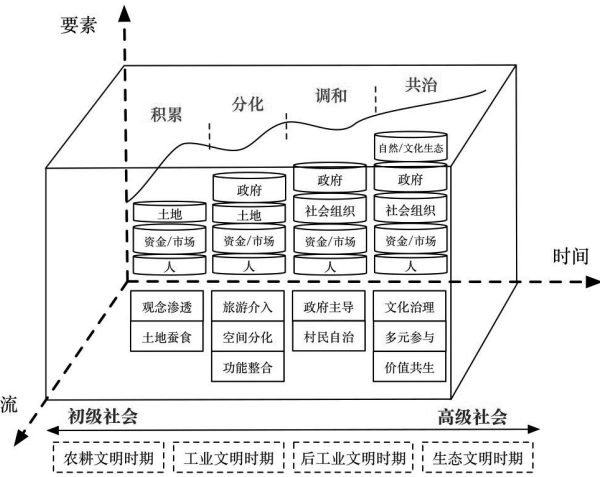


图 3 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机制

政府调控在居住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作用。开发企业和外部群体在乡村社会生产中带来了新的组织模式,如生产逻辑、雇佣关系和管理模式等,使乡村社会更加规范化^[43]。为更好地进行旅游开发,政府从 Z 村集体手中获取开发权,引入旅游企业合作,制定古村落旅游最佳线路,由当地义务导游带

领参观。同时,Z村村民在家庭和家族观念驱动下,积极参与村落地方认同构建、传统村落保护和集体事务,对村落的开发与保护建言献策,维护社会生态系统稳定。多元主体参与的调控机制对传统村落的演变速度和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如协调多元主体目标,维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控制旅游用地对农用地的占用,防止旅游空间无序扩张。

(三)乡村文化场景时空演化优化路径

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文化场景是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同时展现当地特色文化并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社会公共生活功能。一个理想的文化场景需具备完整性、多元化、包容性等特征,满足各类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鼓励自我表达与共同参与,实现全面发展。

1. 空间赋能,焕发乡村文化场景生产面向

乡村文化场景是传统耕作方式的延续,反映了原住民的生活智慧,形塑了最初的场景肌理,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人文、生态、艺术、经济等价值的舒适物。这些空间场景蕴含着丰富的场景内涵和地域特色,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象征,是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44]。地方政府应注重对舒适物功能布局和文化资源传承,保护乡村文化遗产的生态。一方面,可以依托地方自然和人文舒适物发展高品质文旅产品,如村落型酒店和文化民宿,为旧的物质空间重新定义新功能。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导乡村文化场景要素的聚集和空间的扩张,逐步形成区域文旅品牌和规模效应。市场溢出可以促进多元的经营主体基于产业链的分工和联系参与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供给,通过垂直方向上的产业链延伸和统筹空间优化促进区域一体化开发模式,从而焕发空间发展的新动能。

2. 重塑秩序,激活乡村文化场景生活面向

乡村文化场景同时也是满足原住民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聚合体,乡村舒适物分布与功能表征都映射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乡村向旅游发

展的过渡,现如今乡村古民居的产权大多被政府收购,修缮工作统一由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负责,房屋主人只需向政府申请即可,这种保护模式既减轻了房主维护的楼负担,也更好地保存了乡村传统舒适物原始风貌。同时,村落的部分农用地被旅游用地所替代,村民的生活用地也有所增加,水系周边的环境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了农业生产景观的变迁^[45]。对于老年留守主体来说,他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外出务工谋生活,耕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了原有土地后生活变得十分迷茫。因此,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让村民从旅游开发的边缘者转变为旅游发展中的开创者,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并找到生活的依托和慰藉。

乡村不仅是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地方,亦是可供消费的空间^[46],比如村民将自己的生活空间转变功能,开发为餐饮民宿,同时接待研学项目。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激活乡村生活空间的价值,也可以让游客感受到真正悠闲、安静的农家生活,获得更高质量的游憩体验。最重要的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让本地人找回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同,增强主体传承、建设乡土文化的能动性。

3. 培育多元主体,共育乡村文化场景生态面向

乡村的复兴依靠多元主体的共同实践,挖掘乡村文化场景蕴藏的民众传统生活智慧、地方性知识,建设属于乡村自己的文脉标识,并将其融入旅游等业态,推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旅产品,通过有形展示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作为“物”的商品,还包括地方性的人文生态优势^[47]。如Z村的民间文化除家风文化、孝廉文化与耕读文化外,还有皮影戏、书法等,它们作为彰显地方符号意义的重要文化景观,长期经由民间自发传承面临着技艺封闭的风险^[48]。Z村先后引进了三家旅游地产开发公司对村落进行旅游开发。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推动下,Z村传统文化资源成为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基本载体,依托研学、写生以及展演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展示特色文化。民间文化走出静态遗产空间,寻找到在乡土生态土壤下绵

延不绝的动力源泉。新建的文化走廊和孝廉家风传承馆是展示传播乡村文化遗产的优质平台,提供了作为外来客融入地方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场景和文化空间生产的渠道。同时,新的文化能量和经济存量注入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系统中,激发村民参与文化遗产和乡村活化开发的主体性,推动乡村振兴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9.
- [2] 龙花楼, 屠爽爽, 戈大专. 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 309-319.
- [3]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 [4] 陈波. 公共文化空间弱化: 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 人民论坛, 2018(21): 125-127.
- [5] 刘沛林.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地理研究, 2015, 34(7): 1205-1212.
- [6] 朱媛媛, 罗源, 王优聪, 等. 城乡要素交互作用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机制研究: 以河南舞阳县柴庄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3, 43(5): 847-859.
- [7] CLOKE P, GOODWIN M. Conceptualizing countryside change: from post-fordism to rural structured coherenc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2, 17(3): 321-336.
- [8] MARSDEN T. Rural futures: the consumption countryside and its regulation[J]. Sociologia ruralis, 1999, 39(4): 501-526.
- [9] MCCARTHY J. Rural geography: multifunctional rural geographies-reactionary or radical?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6): 773-782.
- [10] LAKSHMANAN T R. A systems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J]. World development, 1982, 10(10): 885-898.
- [11] 刘祖云. 社会转型: 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6): 35-40.
- [12] 刘玉, 刘彦随, 郭丽英. 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内涵及其政策启示[J]. 人文地理, 2011, 26(6): 103-106, 132.
- [13] 房艳刚, 刘继生.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 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J]. 地理学报, 2015, 70(2): 257-270.
- [14] 陈波, 徐若蓝.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 以二官寨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2(12): 61-71.
- [15]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J]. 地理学报, 1998(4): 79-85.
- [16] 赵旭东.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 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J]. 社会科学, 2009(2): 53-63, 189.
- [17]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 [18] 孙九霞.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遗产与空间治理: “文化遗产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J]. 地理研究, 2019, 38(6): 1283-1289.
- [19] ANDERSON M K. Tending the wild: native American knowledge and the management of California's natural resource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334-358.
- [20] 胡最, 邓运员, 刘沛林, 等.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J]. 地理学报, 2020, 75(4): 789-803.
- [21] 李伯华, 曾灿,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8): 153-159.
- [22] 杨耕.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沉思[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4): 99-121, 206.
- [23] 魏宏森, 曾国屏. 系统论: 系统科学哲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213-220.
- [24] 杨忍.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J]. 地理学报, 2019, 74(8): 1622-1636.
- [25] 杨迪, 李广斌, 秦晴. 基于资本下乡的乡村绅士化机制研究: 以南通市仇湖村乐百年小镇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0(12): 97-105.
- [26] MBIBA M, COLLINSON M, HUNTER L, et al. Social capital is subordinate to natural capital in buffering rural livelihoods from negative shocks: Insights from rural South Afric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65): 12-21.
- [27] REN G, ZHU X, HEERINK N, et al. Persistence of land reallocations in Chinese villages: the role of village democracy and households' knowledge of polic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93): 336-344.
- [28] ZHOU J, YU L, CHOGUILL C L.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rural society: the blossoming of Taobao village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83): 81-87.
- [29] 戈大专, 陆玉麒.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J]. 地理学报, 2021, 76(6): 1422-1437.
- [30] 王成, 龙卓奇.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逻辑认知及

数理表达[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35-543.

[31] CARPENTER S R, WESTLEY F, TURNER M G. Surrogates for resilie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J]. *Ecosystems*, 2005, 8(8): 941-944.

[32] TURNER B L, MATSON P A, MCCARTHY J J, et al. Illustrating the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 three case studie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14): 8080-8085.

[33] FOLKE C, CARPENTER S, ELMQVIST T, et al.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ilding adaptive capacity in a world of transformations [J]. *AMBIO*, 2002, 31(5): 437-440.

[34] 陆兵哲. 社会空间的继替与共存: 一个郊区村庄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23, 38(2): 182-203, 230.

[35] 丁建军, 王璋, 余方薇, 等.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 以十八洞村为例 [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568-2584.

[36] 李久林, 储金龙, 李瑶.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保护发展研究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0): 101-109.

[37]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M]. 李康等,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93-100.

[38] 熊万胜. 聚落的三重性: 解释乡村聚落形态的一个分析框架 [J]. *社会学研究*, 2021, 36(6): 23-44, 226-227.

[39] 王鹏飞. 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 [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57-1667.

[40] 文军, 吴越菲. 流失“村民”的村落: 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 基于 15 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4): 22-45, 242-243.

[41] 丁传标, 赵永琪, 陶伟. 城市化进程中家屋空间重构的过程、内容与逻辑: 以广州珠村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7, 37(9): 1326-1336.

[42] 傅才武, 李俊辰. 乡村文化空间营造: 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空间转向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9(5): 5-15.

[43] ZHENG H, MA W, GUO Y, et 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farm employment and mechanization service expenditure in rural China [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2, 14(1): 84-105.

[44] 傅才武, 程玉梅. 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构建的历史逻辑 [J]. *文化软实力研究*, 2022, 7(2): 41-53.

[45] 李伯华, 陈新新, 窦银娣, 等.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传统村落空间治理研究: 以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例 [J]. *地理科学*, 2023, 43(7): 1154-1166.

[46] 关晶, 张朝枝. 民宿业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特征与驱动机制: 莫干山镇案例研究 [J]. *旅游论坛*, 2020, 13(2): 81-93.

[47] 陶慧, 张梦真. 乡村遗产旅游地“三生”空间的主体价值重塑: 以广府古城为例 [J]. *旅游学刊*, 2021, 36(5): 81-92.

[48] KIM J. Ethnic capital, 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9, 42(3): 357-385.

(本文责编: 润泽)